



中国公众文化需求 满足调查

ZHONGGUO GONGZHONG WENHUA XUQIU
MANZU DIAOCHA

戴茂堂 华汛子 赵曼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中国调查”丛书



中国公众文化需求 满足调查

ZHONGGUO GONGZHONG WENHUA XUQIU
MANZU DIAOCHA

戴茂堂 华汛子 赵曼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公众文化需求满足调查/戴茂堂,华汛子,赵曼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6

ISBN 978-7-216-08948-7

I. 中… II. ①戴… ②华… ③赵… III. 群众文化—文化工作—调查研究—中国 IV. G2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4600 号

责任部门:时政经济分社

责任编辑:曾若雪

封面设计:武汉尚上创意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王铁兵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字数:210 千字

版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7-216-08948-7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张:13.5

插页:3

印次: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中国调查”丛书编委会

顾问：冯天瑜

主任：曾 婕

编委：刘宏兰 杜绍祥 谢双林 谢洪辉 温 健

主编：曾 婕

编审：黄正谋 刘 洁 江立华 桂 胜

编务：陈 芳 肖 利 陈 沛 陈 弘

吾辈使命

——写在前面的话

癸巳年秋，珞珈山下。著名历史学家、荆楚社科名家冯天瑜先生送我一套《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此书是冯先生等学者从浩如烟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旅行调查材料中，选择代表性的篇目翻译汇集而成。冯先生在扉页上题写赠言：“日本为侵略中国，自明治以来，对中国作翔实调查，此书所载，可一斑窥豹。向强敌学习，对国情做深入的调研，是我辈的使命。”这年夏天，湖北省社会科学界第八次代表大会紧张筹备，我们曾邀冯先生等专家学者为湖北社科事业的繁荣发展出计献策。先生建议，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重视国情省情调查。《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一书的价值，体现着冯先生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寄语，以及冯先生对湖北社科事业的关切支持，直接促成了“中国调查”项目的产生。

尧舜孔孟，唐宋明清，分封割据，天下一统，农工兵商，京韵吴语，上下五千年，社会生活何等丰富多彩；江河湖海，崇山峻岭，楼台亭阁，村舍酒肆，秦砖汉瓦，藤角根穗，纵横九万里，中华大地如此物华天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时代印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文明进步，更是激荡起伏，日新月异。热爱并建设这个国家，当了解认识这个国家，而客观调查、认真分析这个国家，则是了解认识的有效途径。“向强敌学习”，要从具体事情做起，以至比强敌更强。吾辈的使命在认识，更在担当。于此时此地开始，坚持数年并由楚地推及全国的省情国情调查或将对社会有微薄贡献。基于此认知，湖

北省社科联正式确定将“中国调查”作为重点项目予以立项。

社会调查，古往今来皆为执政者所重视，更有立志于此的文人学者，跋山涉水，实地考察，经年不倦。卷帙浩繁的古今文库中，有许多经典不朽之作可为楷模。“中国调查”丛书立项论证会上，专家皆推崇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为范本。专家以为，“中国调查”各分篇，无论是全景展现，还是微型研究，无论是实地考察，还是问卷访谈，皆应如《江村经济》，尊重社会发展之客观规律，彰显实事求是之人文精神，追求科学严谨之学术标准，戒浮光掠影，戒空谈杜撰，戒阿谀奉承。《江村经济》是“人类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布·马林洛夫斯基语），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调查”项目而言，如果能有些许“一斑窥豹”的作用，我们将无比欣慰。

“中国调查”任重而道远，我们将脚踏实地，努力前行，不辱使命。

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曾捷

写于乙未年樱花盛开时节

总 序

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者切入各相关领域，从事社会调查，已历岁时，初成一批各具特色的调查报告，辑为“中国调查”丛书，这是令人欣慰的一项成果。之所以说“令人欣慰”，因为在这里没有新老八股式的空话、套话、大话，而所见皆质朴、真实的基层情事，我们从中可以嗅到泥土的芬芳，听到民众的呼唤，触摸到社会生活的脉动。

社会调查是认识社会的基本方法。无论是实际社会工作者还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离开社会调查将一事无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概莫能外。

广义的社会调查，古已有之，如周代重视“采风”，专设“行人”“輶轩之使”到各地搜集民歌以了解民间疾苦，《诗经》中的《国风》就是采风的精选集结。汉代派员巡行，皇帝微服私访，设立乐府，采集乐府诗以认识百姓情志、社会实况，如此等等，皆初备“社会调查”之义。

系统的、有计划的社会调查始于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欧美、日本运用实证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经济统计学方法、抽样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方法、横剖研究与纵贯研究相结合方法等，对本国和他国作详尽的、巨细无遗的社会调查，并以科学手段加以整理，做出描述的、解释的和提出对策的研究成果。日本为实现其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对中国的自然、社会、人文等作了广泛、细致的调查研究，仅以两个较庞大的中国调查机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前身汉口乐善堂）为例，其调查规模便足可惊人：它们分别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四十年和六十年的调查，留下卷帙

浩繁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满铁的中国调查报告有数十万件,出版书刊数千种,是各国研究近代东北、华北、华东社会的材料渊藪(当代西方汉学家黄宗智、杜赞奇的近代中国社会史名作多取材于此)。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地域达除西藏外所有省区之各市县镇(还远抵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中南半岛、南洋群岛),涉及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民俗各领域,大至各时段政情演变(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小至一条河川有几处渡口、冬夏各能摆渡多大船只。无怪乎抗战期间日本的军用地图比国民党军队的军用地图详尽、准确。在东亚同文书院对中国长期调查的基础上,日本东亚同文会1917—1920年编纂了《支那省别全志》,1941—1946年编纂了《新修支那省别全志》,2015年5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两志全50册。我在为两志影印版所作序言中说:“它让我们具体了解近代日本从事中国踏查的广度与深度,认识其用心之深、用力之切,从而激发国人警醒;同时,通过展示日本的中国调查材料及其加工成品,也为晚清、民国研究敞开一个鲜为人知的资料库,并从方法论上提供若干研究国情、地情的启发。”^[1]

毛泽东1941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这里对“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来不及作较完备的社会调查的估量,大体符合历史实情。但需要补充的是,自晚清以降,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重视并躬亲社会调查,如清末的湖北留日学生鉴于“各国人之于其国也,无一事不有调查会,或政府提创之,或人民自组织之”,在1903年成立“湖北调查部”,对在本国、本省开展社会调查有所规划,列举了“政法上之调查”“教育上之调查”“经济上之调查”“实业上之调查”“军事上之调查”“历史上之调查”“地理上之调查”“民族上之调查”“出产上之调查”“交通上之调查”“外人势力上之调查”诸方面的调查细目。^[2]然而限于条件,这一计划无法在晚清实现。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某些部门,如地震局,曾组织力量作专题社会调查,

[1] [日]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省别全志》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2]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43~452页。

留下一批宝贵材料。某些从西方学习社会学、民族学回归的中国学者，作过高水平的社会调查研究，如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至今仍闪耀光辉，被视作社会学范本。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社会调查”丛书（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也不乏佳作，如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便颇有价值。此后，各类调查研究报告续有面世，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许烺光的《祖荫下》、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等。

这批在艰困的条件下完成的社会调查论著，达到令国际学术界肃然起敬的水平，足证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在社会调查研究领域攀登高峰。当然，就整体而言，清末、民国积贫积弱，战乱频仍，国家与民间无力作大规模、长时段、成系统的社会调查。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以我省而论，有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统筹组织，有各方面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投入，未来可望涌现一批理论明晰、调查细致深入、记述真实可靠、建策独到的成果，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和精准数据。现在，“中国调查”首批项目已经付梓，又闻省社科联已筹谋接下来五年的项目计划，拟定调查研究重点，制定严谨的学术要求和规范，并将陆续推出“中国调查”丛书，以展现湖北省社科界调查研究原创力和高水平。我们乐观其成！

冯天瑜

2015年8月4日于武昌珞珈山

导 言

就“文化”一词来讲,它是“文”与“化”的结合,“文”的本义是指花纹,后来在人类的认知领域里引申为通过后天教化形成的德行与修为;“化”的本义是改易,这种改易寓意着天地从无到有的“造化”,以及宇宙生成的“演化”,是古人对运动、变化观念的一种认知。今天,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从广义上来看,“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社会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狭义上来看,“文化”则侧重于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思想、道德、风尚、文艺、科技、法律等以及相应的制度和组织。一般来说,文化往往是一个国家最有显示度的名片。在这张名片上,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国家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最强大的力量源泉、最温暖的精神家园、最高贵的思想元素,并且越是有影响力的国家越注重打造自己的文化名片,越注重打造自己文化名片的国家也往往越是有影响力。事实上,一种文化与一个国家总是良性互动的。文化是构成一个国家获得发展和进步最深刻、也最深沉的动力。恰如所有的革命归根结底都是文化的革命一样,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的所有发展和进步归根结底都是文化的进步。因此,伟大国家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文化作支撑。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已是当今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决胜负、定成败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的开幕式上讲话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

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

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在经济建设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可厚非。只是我们别忘了,在坚持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及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和良好文化条件。同时,我们也别忘了,文化的观念革新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和深层动力,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需要诉诸求助于文化观念的革新来解决。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已经成为影响经济、政治及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一极,文化的力量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先进的文化作保证,一个国家如果精神上不处于高地、文化上不处于高地,经济就很难走在前列,繁荣也未必能够持久。

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理想信念缺失,精神状态滑坡,就会失去凝聚力、战斗力。与经济和科技优势一样,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优势也越来越成为内生性、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如果精神上不处于高地、文化上不处于高地,也就很难有经济上的高地、军事上的高地。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大打“文化牌”,推广其文化信仰、核心价值,并导致文化冲突、文化霸权等诸多问题之时,我们更是切身感受到: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文化生活、满足文化需求、构筑精神家园越来越成为我国公众的热烈愿望和价值选择,以至于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19世纪靠军事改变世界,20世纪靠经济改变世界,21世纪靠文化改变世界。当中

[1] 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载《党建》2014年第10期。

国连续三年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不可或缺之贡献的同时,也需要形成与之相应的文化软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道德风尚与文明素养境界,标志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软实力,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当务之急,就是要用文化认同来促使中国在上世界上发声,提升中国话语权。因此,以战略性、前瞻性视野加强对文化发展、文化需求、文化满足的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

从国内看,我国发展进入关键期,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增长进入平缓期,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全面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中国共产党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标志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文化理论创新和实践方面走向成熟。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是进一步提出,中国必须走文化兴国、文化强国的道路。这既是必然的选择,

又是唯一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升华和创新。2012年党的十八大深刻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我们今天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是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2014年3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对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动员部署。会议强调,全国将围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一战略目标,以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为动力,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加快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重视和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切实推动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让文化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民众,让民众的文化需求可以更好更体面地得到满足。2015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亲切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必须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当下的中国,惠民问题、民生问题已经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上至中央政府,下到地方基层,时时都有关心民生的呼声,处处都有解决民生的举措。何谓民生?民生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诉求。一般来说,民生问题起初总是体现为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的满足,这是因为衣食住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需求的

满足是基本民生、基础民生。随着人类文明越发展,民生内涵就越丰富:远古时期,先民岩居穴处、茹毛饮血,民生是果腹之“食”和御寒之“衣”;农业文明时代,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民生增加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等要求;现代社会,民生不仅包括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还包括精神文化产品的不断丰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数亿中国人在过去30多年摆脱了贫困。随着中国社会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成为时代的课题。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已不满足于填饱肚子,他们希望有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公众不再单一地追求物质生活享受,而是开始要求精神生活的享受,满足文化需求不再成为新鲜事儿。当我国公众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时,文化需求的满足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民生更高层次的期待,以文化满足来丰富、提升民生的内涵将成为必然。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民生,同样,尊重人的文化权益、关注人的文化生活、让文化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人民群众也是民生。

没有文化的民生是不完整的民生,是层次不高的民生,也是不健康的民生。文化需求也是民生需求,文化需求的满足其实就是文化民生问题。文化民生是指用文化产品或服务如艺术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来温润心灵、舒缓压力、涵养人生,以满足民众的精神生活。我们讲幸福指数,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尺度;我们讲生活质量,文化应该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完美社会,就既要让公众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公众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让高质量地满足公众文化需求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有没有文化需求以及文化需求有没有得到很好满足本身就是衡量人的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文化需求是人作为一种有生命、有意识的社会存在所内在具有的。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说:“有意识的生产活动

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分开来。”^[1]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体现了“文化”与“非文化”的界限,也是显示人的实际发展及其达到的人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文化与和谐》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部分就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公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表明,人类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条件下,必然向满足文化需求方向迈进。世界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崛起,既体现了产业演进的客观规律,更体现了人类从获取自然资源以满足物质需求走向发挥文化创造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文化需求的伟大文明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历史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丰润的道德滋养;今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是灵魂》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位哲学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

如果说文化是灵魂,人则必须有文化方面的需求,且文化需求必须高质量地得到满足,那么,中国公众文化需求是否强烈?文化需求是否得到了较好满足?文化需求满足是否存在明显的缺憾?弥补存在的缺憾是否具有有效对策?我们认为,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理论的反思,更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当年,毛泽东回到湖南调查32天,实地考察湘潭、湘乡等5县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地回应了对农民运动的诋毁和责难。正是凭着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的真功夫,我们党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才得以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走出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之路。现代社会,无论交通如何便捷,信息如何发达,技术如何先进,调查研究依旧是掌握事情真相、了解问题实质的最有效、最直接、最基本的方法。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毛泽东做出过若干非常重要的调查研究,并留下了著名的论断:“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1]在新的历史情形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并且,习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地方发展要与实际相结合,当县委书记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他还说:“我们国家地域、条件差异巨大,不是简单地一概而论。作为县委书记,关键是要通过调研搞清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准确把握我国公众文化需求满足状况,显然也不能异想天开、闭门造车,而是必须有针对性地开展问卷调查、个别访谈。

一个国家的公众文化需求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它有利于丰富人民的生活,培养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一个国家的公众文化需求强度也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就此而言,对于我国公众文化需求满足状况展开调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紧迫课题。在国内,目前针对文化保障事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研究有很多,如罗能生等在《我国区域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中通过政府文教投入、企事业文教投入、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居民文教投入四个指标来测量地域文化保障力,得出东部地区较强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除内蒙古、河南两省,其他省都比较弱,西部地区除四川和陕西,大部分落后于中东部地区的结论^[3];张月花等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视角下西安文化软实力实证评价与分析》中通过文化支持和生产规模两个

[1]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7页。

[2] 习近平:《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脚踏实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载《人民日报》2013年7月24日第1版。

[3] 罗能生、郭更臣、谢里:《我国区域文化软实力评价研究》,载《经济地理》2010年第9期。

指标来测量西安的文化保障力,结果表明西部大城市西安的文化保障力远低于东部大城市北京、上海的水平^[1]。侧重于不同人群文化需求保障的研究也比较普遍,如王涤等在《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调查》中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对浙江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做出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从制度安排、社会支持、自身设计和现实基础4个方面提出具体对策思考与建议^[2];李菁等在《城市居民社区文化需求研究——以石家庄市社区为例》中以石家庄市社区为例,对城市居民社区文化需求进行了研究^[3];郑月琴在《农民工文化需求定位及其实现路径》中从“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分析了农民工文化需求的特殊性,探寻切实可行的实现农民工文化需求的路径^[4]。但一直以来,在学术界还很少有全面针对我国公众文化需求满足状况的系统性研究。为此,围绕“中国公众文化需求满足状况”这一主题,课题组于2014年6—12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和文献查阅工作。本次调研,课题组发放问卷的数量为4708份,有效问卷为4500份。个别访谈68人次。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组形成了关于中国公众文化需求满足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对中国公众文化需求满足的基本现状做出了描述,重点分析了中国公众文化需求满足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讨论了消除这些突出问题的主要思路与策略。

[1] 张月花、薛平智、储有捷:《创新型城市建设视角下西安文化软实力实证评价与分析》,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年第14期。

[2] 王涤、张旭升:《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调查》,载《人口学刊》2008年第5期。

[3] 李菁、郑健敏、柳敏和:《城市居民社区文化需求研究——以石家庄市社区为例》,载《石家庄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4] 郑月琴:《农民工文化需求定位及其实现路径》,载《农村经济》2005年第3期。